

YI XUE XIN ZHI

易学心知

林忠军/主编

(京)新登字 04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易学心知/林忠军主编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1995.5

ISBN 7-5080-0673-9

I . 易… II . 林… III . 周易—研究—文集

N . ①B221②B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6360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.25 印张 223 千字

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500 册

定价: 9.80 元

序 一

近十年来，国内出现了“周易热”，历久不衰。这不是偶然的。这是因为，《周易》经传确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珍贵宝典，其中含有深奥渊湛的智慧，至今犹能给人以启迪，值得进行深入的钻研探索。同时，《周易》经传有些文句字词比较简晦难解，因而可以做不同的注释，历来争论不决，难以达到一致的结论。汉魏以来，易学有象数派与义理派的争论。迄于现代，史学家以《易》证史，科学家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研治易学，更有新解。于是关于易学的讨论日益丰彩了。

近年考古发掘，又发现了帛书《周易》，既有帛书卦爻辞，又有帛书“易传”，俱不同于汉代流传的通行本。汉代流传的通行本系田何所传。帛书《周易》以及《易传》，当系汉初楚地所传，与田何传本不同。这也证明，汉代初年，《周易》经传确有不同传本。至于这些不同传本何者在先、何者在后，尚须进行考索。汉代以后，以迄近代，在历史上起作用的，对于汉唐宋明的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的，还是田何的传本。这也是历史事实。帛书《周易》何以失传，亦值得研究。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对于帛书《周易》进行了考察，这是有重要意义的。

国际青年易经学会，以青年学者为主干，编撰《易学心知》，基本上刊载了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，这是易学研究的新生力量。编者希望我写篇序言，于是略述自己的一些感想，以为之序。

张岱年

一九九四年八月于北京大学

序二

深思好学两相成，
卓犖全凭弱岁争。
喜为老夫添后劲，
眼明手快几豪英。

历史为藏往知来之学，哲学则探微索隐，旨在彻悟。为术不同，入门亦异。昔颜子心斋，王弼注易，皆在英年；余廿五岁著《易通》，当时所造，垂老无改，即此故也。《易学心知》即将问世，索序于余，不自谫陋，爰缀数语归之，愿与共勉。

甲戌中秋苏渊雷仲翔甫时年八十七

目 录

帛书《易传》概论	廖名春(1)
从马王堆帛书《要》篇追寻《易经》的原著精神	[港]谢宝笙(15)
论《周易》筮数与象理的本质及其占断原理的矛盾	梁韦弦(30)
《易》中“九”、“六”由来蠡测	王新春(42)
《杂卦》卦序论	任俊华(54)
易学研究之我见	刘光本(63)
论虞翻的纳甲说	林忠军(75)
王弼《周易注》的相关问题	[台]蔡振丰(82)
王夫之的易学哲学初探	[韩]金珍根(110)
焦循对汉《易》的理解与选择	陈居渊(124)
建构与诠释——《易经》哲学的五个层次	杨宏声(136)
双重选择论的原理与《易经》	
	[美]王振武撰 付永军等译(156)
从思维角度看《周易》	安道玉(177)
回到伏羲——从源头上来认识《易经》	王园(185)
易——意的外化与复归	李章印(191)
论公理化哲学——也谈哲学的科学化	陈继元(202)
中心论	廉永善 张正春(216)
《周易》与耗散结构理论	李标 张其成(227)
爻群的矩阵结构及其难题	王俊龙(238)
全真道的气功养生说与易学关系略论	詹石窗(256)
《易》与中医变蒸、天癸学说	刘鸣(270)
古太极图的千古之谜(摘要)	[港]冯庆辉(277)

帛书《易传》概论

廖名春

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土的大量帛书中,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《周易》方面的内容。据统计,有关《周易》方面的帛书共二万多字,既有经,又有传。帛书《易经》,《文物》1984年第3期早已刊布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所作的《马王堆帛书<六十四卦>释文》,但帛书《易传》的内容,虽然时有传闻,但二十年过去了,一直没有公布。在前辈学者的支持下,湖南博物馆的陈松长先生给予了我最为关键性的帮助,我从1992年底开始整理、研究帛书《易传》,于1993年6月,基本完成了帛书《易传》诸篇释文的初稿。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3辑上,发表了陈松长的《帛书<系辞>释文》,^①陈松长和我合著的《帛书<二三子问>、<易之义>、<要>释文》,在海内外学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帛书《易传》涉及对帛书《易经》、今通行本《易经》的研究,涉及到对今本《易传》形成、作者、时代的认识,对研究易学史、儒学发展史有极其重要的作用。下面,笔者结合自己对帛书《易传》的整理、研究工作,对帛书《易传》的内容作一概述,并就由此引发的一些重要问题谈自己的观点。

帛书《易传》共六篇,约一万六千余字,分载于两张黄帛之上。字体为隶书,和帛书《易经》相同。帛书《周易》经、传二万余字,都是一人的笔迹。

帛书《易传》的第一篇原无标题，未记字数。其第一行顶端涂有墨丁标志，以“二三子问曰”开头。按照先秦古书定名的惯例，我们称之为《二三子问》。《二三子问》与帛书《易经》相接，二者抄在同一张黄帛上。《二三子问》共三十六行，按每行约七十二字计算，共二千六百余字。

于豪亮先生曾将这篇帛书分为两篇，认为自“二三子问曰”至“夕沂若厉，无咎”止为一篇，其后至“小人之贞也”又另为一篇。^②这是有问题的，事实上，尽管“夕沂若厉，无咎”这一句后还剩三字的空位，抄者就另起一行了，但这并不能说明这是两篇帛书。因为从内容上看，它们前后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。前者论述的是乾卦九二、九三爻辞之义，后者紧接着阐发乾卦九五爻辞、用辞之旨，然后是说解坤卦初六、六二、六三爻辞。^③像这样一种结构，我们怎能把它腰斩为两篇呢？应该知道，帛书每行字数的多少也有较为随便之时。像一段话抄完了，尚剩一两字空，再抄另一段时，往往就另起一行。不过这里的空稍留多了一点而已。所以，“夕沂若厉，无咎。”不是两篇《易传》的分界，而只是一篇《易传》之内两小节之间的分界。

《二三子问》文中以黑圆点分为三十三节。第一节文字较长，论述“龙之德”；从第二节起，开始解释《周易》的卦爻辞，依次论述了乾、坤、蹇、解、鼎、晋、屯、同人、大有、谦、豫、中孚、小过、恒、艮、丰、未济等十七卦的卦爻辞。从总体上，其论述和引《易》是以今本卦序为准的，与帛书《易经》的卦序并不相同。

《二三子问》解《易》有一明显的特色，就是只谈德义，罕言卦象、爻象和筮数，这种风格，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所载易说迥异，尤近于《文言传》、今本《系辞传》中的“子曰”。《二三子问》有一半的篇幅是论乾坤两卦，这种重视乾坤两卦的思想同今本《易传》的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也是一致的。

帛书《系辞》同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、《繆和》、《昭力》抄在另一张黄帛上。帛书《系辞》可以说是帛书《易传》的第二篇。它第一行顶端

涂有长方形墨钉，是篇首的标志。共四十七行，按每行七十字计算，应有三千三百字左右，但由于残损，现只剩三千字。

帛书《系辞》有没有尾题？尾题是否称《系辞》或《系辞传》？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问题。从现已公开发表的照片看，帛书《系辞》结尾处有残损，但在相当于尾题的地方，尚余两个小墨点。^④这两个小墨点，应该是尾题第一字残余的墨痕。因此，帛书《系辞》可能原有尾题，也可能象大多数帛书一样，也应记有字数。至于尾题之名，在未找到该残片时，还不好说它一定就是“系辞”，因为出土文献给我们的意外实在是太多了。但从推测的角度而言，它名“系辞”的可能性较大。^⑤

帛书《系辞》与今本《系辞》基本相同。所不同处除通假字很多外，主要是比今本《系辞》缺少了若干章节。具体而言，帛书本缺少今本《系辞上》的第九章，^⑥今本下篇第五章的一部分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章的一部分、第十、第十一章也不见帛书《系辞》。此外，还有一些重要的意义不同的异文，如今本的“太极”帛本作“大恒”。对此，学者们有着很不相同的认识。

王葆玹先生认为，“太极”这一概念原为“大恒”，后来人们因为避汉文帝刘恒之讳，才将帛书的“大恒”改作了今本的“太极”。^⑦笔者认为“太极”这一概念的流行，不可能晚至汉文帝以后。先秦书除《系辞》有“太极”概念外，《庄子·大宗师》也有。以恒代极，这种避讳之例及其严厉的程度，在汉代是罕见的，难以令人信服。从字体上，恒、极两字在帛书字形接近。因此，“恒”字当是“极”的误书。^⑧张政烺也持此说，认为“恒与极字形相似，致误”。^⑨饶宗颐先生不同意廖的误书说，认为“恒”字非误，“大恒”即大经，是常道，是楚学、黄老之学的固有观念，大恒与太极、太一是一事的异称。《墨子·非攻下》、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都有“太极”之名。^⑩

帛书《系辞》无今本《系辞上》的“大衍之数”章，张政烺先生认为今本此章大约是后加的，是西汉中期的作品。^⑪李学勤先生通过

分析《论衡·卜筮》篇和《汉书·律历志》的记载，特别是分析“大衍之章”文字的内容和形式都与《系辞》其它各章融合无间，认为“大衍之数”章的起源不可能晚，大概在《系辞》形成的时期即已存在，没有理由说《系辞》其余部分和此章出于二手。^⑫笔者在李说的基础上，通过分析“天一、地二……”句同“大衍之数”章的逻辑关系，通过引证熹平石经、子夏《易传》等材料，证明早在西汉中期以前，《系辞》中就有“大衍之数”章了。而帛书《系辞》存有“天一、地二……”句，其祖本中势必有“大衍之数”章。因此，说“大衍之数”章后出，显然是错误的。^⑬

《易之义》是帛书《易传》的第三篇，它紧接帛书《系辞》，第一行顶端涂有墨钉标志，以“子曰易之义”开始。约四十五行，按每行七十余字计，共三千一百字左右。此篇最后一行残缺，从其残片看，应该有尾题和记有字数。可惜此残片上的四个字，从照片上看，比较模糊，一时难以确认。^⑭

《易之义》文中以圆点隔开为若干章节。由于文间有缺，加之抄写者有很大的任意性，其确实节数尚不好说。从其内容看，第一行至第二行是说阴阳和谐相济，为《易》之精义。第三行至第十行历陈各卦之义，其说解多从卦名入手。第十三行至第十五行左右，为今本《说卦传》的前三章。第二十二行至第三十四行，分别阐述键（乾）川（坤）之“羊（洋）说”。从第三十四行至第四十五行，为今本《系辞下》的第六、七、八、九章。

帛书《易传》的第四篇是《要》，它紧接《易之义》，第一行顶端也有墨钉标志，文末有尾题“要”，并记字数“千六百四十八”，大致抄为二十四行。帛书《要》第一至第八行基本残缺，但篇首的墨钉仍在。从其残存的文字来看，它第一、二行的内容应是今本《系辞下》的第十章。^⑮韩仲民先生认为此章收在《要》篇以外的“另一篇佚书（指《易之义》）之中”^⑯，显然是错误的。其第九至第十二行，主要是今本《系辞下》第五章的后半部分。第十二行至第十八行，记载孔子

晚年与子贡论《易》之事。第十八行的最后两字至第二十四行末尾为其最后一章，记孔子给其门弟子讲述《周易》损益二卦之理。

帛书《缪和》、《昭力》是帛书《易传》的第五、第六篇。《缪和》紧接《要》，第一行顶端也涂有墨钉标志，以“缪和问于先生曰”起头，以“观国之光，明达矣”作结，末尾有尾题“缪和”，未记字数。《昭力》紧接《缪和》，也是另起一行，但第一行的顶端没有墨钉标志，以“昭力问曰”开头，以“良月几望口口之义也”作结。末尾有尾题“昭力”，记字数“六千”。于豪亮先生说，此篇甚短，所记字数应是两篇字数的总和，^⑩甚是。具体说来，《昭力》共十四行，其中末尾一行只二十二字，其余十三行平均字数为七十字上下，共九百三十字左右。《缪和》共五千零七十字左右，其行数约七十，每行字数平均也在七十上下。两篇相加，其行数在八十四行左右。^⑪

《缪和》、《昭力》虽然各自名篇，但从内容来说，它们实即一体，犹如一篇文章的上下篇。与帛书《二三子问》、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一样，《缪和》、《昭力》大体上也是以问答体的形式解《易》。两篇共约二十七段，段与段之间用黑色小圆点断开。其中《缪和》约二十四段。

《缪和》篇的第一至第五段是缪和向“先生”问《易》，他们师生讨论了涣卦九二爻辞、困卦卦辞、口卦、谦卦九三爻辞、丰卦九四爻辞之义。第六至第八段是吕昌向“先生”问《易》，他们讨论了屯卦九五爻辞、涣卦六四爻辞、蒙卦卦辞之义。第九至第十段是吴孟向“先生”问《易》，他们讨论的是中孚卦九二爻辞、谦卦初六爻辞之义。第十一段是张射向“先生”问《易》，他们讨论了谦卦卦辞之义。第十二段是李平向“先生”问《易》，他们讨论了归妹上六爻辞之义。第十二段至第二十四段解《易》的形式为之一变，它们不再是问答体，而是直接以“子曰”解《易》和以历史故事证《易》。其中第十二至第十八段，每段皆以“子曰”开头，依次阐发了复卦六二爻辞、讼卦六三爻辞、恒卦初六爻辞、恒卦九三爻辞、恒卦六五爻辞、坤卦六二爻辞之义。第十九段至第二十四段则先叙述一个历史故事，再引《易》为

证。这种形式，与《韩诗外传》解《诗》如出一辙。其中第十九段以商汤田猎德及禽兽的故事来发明比卦九五爻辞之义；第二十段以魏文侯礼遇段干木事来发明益卦九五爻辞之义；第二十一段以吴太子辰将人所旧冰八管置之江中，与士人共饮，因而士人大悦，大败荆人的故事来发明谦卦上六爻辞之义；第二十二段以倚相说荆王从越分吴事发明睽卦上九爻辞之义；第二十三段以沈尹树（戌）陈说伐陈之利发明明夷卦六四爻辞之义；第二十四段通过史黑（默）向赵简子分析卫不可伐之事发明观卦六四爻辞之义。这种大量地用历史故事来解说《周易》卦爻辞之旨的方法，可以说开了以史证《易》派的先河。

《昭力》篇共三段，都是以昭力问《易》“先生”作答的形式出现的。第一段是阐发师卦六四爻辞、大畜九三爻辞及六五爻辞的“君卿王王之义”，第二段阐发师卦九二爻辞、比卦九五爻辞、泰卦上六爻辞的“国君之义”，第三段阐述“四勿之卦”之义。与《缪和》等比较，《昭力》解《易》综合性强。《缪和》与《二三子问》等，一般是就具体的一卦一爻之义进行讨论，而《昭力》则揉合数卦数爻之辞，阐发它们的共同意蕴。^⑯

以上六篇帛书，前四篇我和陈松长先生已作释文，业已公开发表。^⑰《缪和》、《昭力》这两篇，笔者虽已作出释文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尚未公开面世。但是，就是前四篇释文的发表，已足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，在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探讨。

关于帛书《系辞》的篇幅问题，学人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。一种认为帛书《系辞》应包括帛书《易之义》，篇幅比今本《系辞》要大，共有六千七百余字。^⑱这是早期的认识。一种后起的观点则认为帛书《系辞》不分上下篇，只有三千余字，而所谓“下篇”实际上是另一篇佚书（即《易之义》）。^⑲从帛书《系辞》存有尾题的痕迹以及《易之义》篇首的墨钉来看，应以后说为是。

如前所述，帛书《系辞》与今本比较，缺少今本《系辞上》的第九

章，今本下篇第五章的一部分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章的一部分、第十、第十一章也不见于帛书《系辞》。这些不见于帛书《系辞》的部分，除今本上篇第九章（即“大衍之数”章）不見于帛书《易传》外，其中大部分皆见于帛书《易传》的《易之义》和《要》篇。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呢？人们提出了两种观点。一是认为这些不见于帛书《系辞》的章节，是汉人塞进今本《系辞》中的，今本《系辞》是汉人揉合帛书《系辞》、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之说而成的。因此，今本《系辞》的写成要晚于帛书《系辞》，不会早于汉代。^②一是认为帛书《系辞》是今本《系辞》的删节本，今本《系辞》的写成应在战国。帛书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与今本《系辞》相同的部分属于援引。其证据是：第一，帛书《易之义》末尾一段是今本《系辞下》的第九章的一些句子，《易之义》对这些句子多称为“《易》曰”或“子曰”。而在当时，既能被称为“《易》曰”，又能被称为“子曰”的，只能是传说孔子所作，其地位相当于“经”的《易传》，很难说是别的什么书。第二，《易之义》所载《系辞》文，也有见于帛书《系辞》的。因此，事实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，见于帛书《系辞》的，就不见于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。第三，帛书《系辞》所缺少的一些章节，从上下文来看，删节的痕迹很明显；而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所载《系辞》文，引用的痕迹也很明显。^③这一争论的是非，我们只要细心读读帛书《易传》的原文，就会清楚。

关于帛书《易传》的学派性质，也有着不同的意见。一种意见认为帛书《系辞》是道家的传本，因为它与今本不同，没有提及周文王和颜回。^④而《繆和》、《昭力》二篇与老子、黄老著作多有雷同之处，出现了相当浓厚的黄老思想成分。从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的重合现象，可以看出《繆和》、《昭力》与老子道家或黄老思想的脉络发展。^⑤一种意见则认为帛书《易传》是儒家学派的著作，帛书《系辞》与今本《系辞》思想上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。《二三子问》、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都是孔子与其弟子论《易》的记载，帛书《系辞》也当如是。“子曰”在《系辞》的主体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《要》载有今本

《系辞》“子曰”的一部分。今本《系辞》的“子曰”到《要》篇中，称为“夫子曰”。其“夫子”又系子贡之师，明显是孔子。因此，《系辞》连篇累牍的“子曰”，应系孔子弟子所记录下来的孔子之言。否定《系辞》为儒家学派的著作，是没有坚实的理由的。《繆和》、《昭力》附骥于《二三子问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之后，提到了孔子、子贡、子路三贤，所论多为儒家之说（如商汤田猎德及禽兽感化邻国等），也当与前几篇为同一学派之传。至于其中有黄老思想的痕迹，这是战国时期各家思想相互影响、学术走向综合的结果。^②

帛书《系辞》是祖本还是抄本？学人们也有分歧。有一种观点坚持帛书《系辞》为最原始的《系辞》，否定帛书《系辞》还有祖本存在。^③其实，不但帛书《系辞》，甚至整个帛书《周易》经、传、都只能是抄本，而不可能是祖本。笔者可以举出三条理由：第一，帛书本大多为通假字，而今本大多为本字；帛书本文句多有衍夺之误，而今本错误较少。比较之下可知，帛书本的许多错误，其实是由于抄写不认真造成的，并非其祖本就如此。^④第二，帛书本字体为隶书，但其中保存有较多的战国古文的痕迹和特点。很明显，这是按照古文本抄写时受古文影响的结果。因此，从帛书的书写特点看，它们肯定是有古文本存在的。^⑤第三，帛书的书写形制与出土竹简相似，特别是其抄写如有脱漏错乱之处，所缺或错简的字数往往正是一枚竹简的字数，说明帛书是从竹简转抄而来。^⑥

懂得帛书《易传》有古文竹简本的祖本存在，从而将其抄写的年代与其写成的时代分开，这对于判断帛书《易传》的史料价值是非常重要的。帛书出土的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于汉文帝十二年（即公元前一六八年），因此，其抄写年代决不会晚于此年，这是下限。帛书《周易》经传避汉高祖刘邦讳为国，但盈字出现频率却较高，显然是不避汉惠帝刘盈讳。因此，其抄写时间应在刘邦称帝之后，刘盈即位之前，即公元前二零六年至前一九四年之间。但与帛书《周易》经、传属于同一抄手所书的尚有帛书《五星占》，而《五星占》所

载的天文记录最迟为汉文帝三年(即公元前一七七年)。因此,作为保守的估计,帛书《易传》的抄写也当在公元前一七七年以前。

作为古文竹简本的祖本,帛书《易传》的写成当更早。我们知道,秦律苛严,“非博士官所职,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,悉诣守尉杂烧之。有敢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者,弃市。以古非今者族,吏见知不举者同罪,令下三十日不烧,黥为城旦”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。帛书《易传》诸篇非“卜筮”之书,也当在禁绝之列。秦代的《挟书令》,直到汉惠帝四年才得废除。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,所出土书籍确未有超出该令的规定。^⑧由此可见,秦代《挟书令》的执行是非常认真的。因此,帛书《易传》不可能写于秦或汉初。

帛书《易传》诸篇中,写成最晚的当属《繆和》、《昭力》。但它们所记史事最晚也为战国初期之事。而且《繆和》所载,往往比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所记更为详实。^⑨如果它不是在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之前写成的话,是很难做到的。如上所述,帛书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对《系辞》既有暗引,更有明引。如此说来,《系辞》的写成当比它们更早,将其时间推至战国中期,完全是有可能的。当然,帛书《易传》诸篇的写成时间,并不相同,它们有早到战国中期的,也有晚到战国末期的。总之,不会出于战国以后。

帛书《易传》的作者,人们有过种种揣测。有说是黄老学者之作,有说是荀子后学所作。这些推测都很难成立。如上所述,帛书《易传》为儒家学派传《易》之作,说它成于黄老学者,是没有理据的。说它们是荀子后学所作,一来时间太晚,从《繆和》和《吕氏春秋》记事的比较可知,《繆和》不会晚于《吕氏春秋》,又怎能为荀子后学所作呢?二来思想观点不符。荀子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“性恶论”,而帛书《系辞》却说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系之者,善也;成之者,生(性)也”,“诚生(性)[存存],道义之门”;帛书《易之义》称“生(性)文武也”,“本生(性)仁义”。这是一种明显的性善论。因此,将帛书《易传》归之于荀子后学之作并不妥当。从《要》、《繆和》等篇的

记载来看，帛书《易传》最有可能是孔子晚年传《易》的弟子在楚地的学生所作，其中较晚的作品很可能就出自缪和、昭力一类人之手。^④

帛书《易传》诸篇对于研究《周易》经文是非常重要的。这六篇帛书，可辨认出的别卦卦名有四十六个，其中不同于帛书《易经》的就有容(讼)、均(姤)、句(姤)、谨(艮)、劳(坎)、媾(需)、既齐、肫(屯)、大牀、大庄、壮、予(豫)、余(豫)、柰(泰)、谦(谦)、覆(復)、说(兑)、誘(睽)、未济、筮闡(噬嗑)、筮益、小蓄、中覆、奂、嫌、兼、酆(丰)、宋(困)、齐(晋)等。这些卦名，除了假借、别写之外，有些确实能发人深思。如《易之义》称坎卦为“劳之卦”，足可印证《说卦》“坎者，水也，正北方之卦也，劳卦也。万物之所归也，故曰劳乎坎”之说。显然，《易之义》的“劳之卦”是有所本的，说它本于《说卦》，应无问题。因此，那些认定《说卦》为汉人之作的说法，就应该加以检讨了。

帛书《易传》六篇引用了《易经》四十四卦的卦爻辞。其引《易》，既有跟今本不同的，也有跟帛书《易经》不同的。其中有些很具价值，下试举两例。

大畜卦九三爻辞今通行本作：

九三，良马逐，利艰贞；曰闲舆卫，利有攸往。

帛书《易经》逐作遂，系别写。艰作根、闲作阑、舆作车，系同音假借、同义通用。卫字残缺。其义基本同于今本。而《昭力》两引此爻，“曰闲舆卫”皆作“阑舆之卫”。今本的“曰”字，用在此处，殊为不通。《释文》引郑玄曰“人实反”，则郑玄以“曰”为“日”，虞翻注、程传、朱熹本义也皆以为日。《昭力》引无“曰”字，多一“之”字，文从字顺，足证今通行本、帛书《易经》皆误。

《二三子问》引未济卦辞说：

未济，亨，[小狐]涉川，几济，濡其尾，无攸利。

“涉川”二字，不见于今本和帛本《易经》，但《史记·春申君传》

和《新序·善谋》记黄歇说秦王所引，也皆有“涉水”二字。水即川。从文义而言，先说“涉川”，再说“几济”、“濡其尾”，事情的发展交代得清清楚楚，较今本直接说“汔济”、帛书《易经》说“几涉”更为合理。所以，应以《二三子问》所引为是。

帛书《易传》对卦爻辞的解释对正确理解经文也是很有启发的。如释坤卦上六爻辞，《二三子问》与现行诸说皆有不同。它训“战”为“接”，同于《说文》“战者，接也”之训。它以“龙”为“圣人”之喻，以“野”为“民”之喻。认为“此言大人之广德而施教于民”，“言大人之广德而下绥(接)民也”。可见所谓“战”，既非指争战之战，亦非指龙在原野上交合之“接”，而是指圣人、大人与民的接交。而所谓“其血玄黄”，它认为是“见文也”，指“圣人出法教以道(导)民”，这就是所谓文明。这种解释，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。

帛书《易传》对于研究今本《易传》和易学史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帛书《二三子问》、《繆和》载有《彖传》之文，其释卦爻辞，说多本于《彖传》、《大象传》、《文言传》、《说卦传》，足可见在帛书《易传》写作时，不但《系辞》早已成形，而且《彖传》、《大象传》、《文言传》、《说卦传》的基本部分都已产生。这对于判断今本《易传》各篇的写成时代，无疑提供了一把客观的标尺。

关于孔子与《易传》的关系，人们多怀疑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之说。而帛书《要》“夫子老而好《易》，居则在席，行则在囊”的记载恰与司马迁说相合。特别是孔子与子贡就学《易》发生的争论，对于研究《周易》的儒学化过程尤为重要。从《要》所载史实我们可知孔子对待《周易》的态度曾经有过相当大的变化。他晚年以前肯定是视《周易》为卜筮之书而不加以重视的，所以当他晚年好《易》时，其弟子子贡就以他的“它日之教”来加以反对。而孔子这时已认识到《周易》有“古之遗言”，有文王之道，所以他不顾其得意门生的激烈反对，冒着“后世之士疑丘者，或以《易》乎”的危险，而潜心于其“德义”的研究，从而开辟了一条迥异于史巫之筮的治《易》新路。

《要》篇这些记载的面世,对于易学史和经学史的研究,意义是相当深远的。

对于帛书《周易》经、传之间的关系,过去人们多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、一体性。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。从帛书《易传》引《易》的情况看,其卦爻辞不同于帛书《易经》的情况屡见,这一事实说明帛书《易传》引《易》所用的底本并非帛书《易经》本。从帛书《易传》诸篇引《易》所反映出的卦序来看,它们遵从的是今通行本之序,而非帛书《易经》之序。除此之外,帛书《易传》多以健川并举,损益连言。我们知道,在帛书《易经》中,健为首卦,川为第三十三卦;损为第十二卦,益为第六十四卦。只有在今通行本中,乾坤、损益才连在一起。所以,帛书《易传》屡称健川、损益,应该是从今通行本之卦序。^⑨

过去,人们多喜用《易之义》的“天地定立(位)”四句来说明帛书《易经》的卦序结构。^⑩依此说,帛书《易传》的内容与帛书《易经》卦序有着内在的联系。这种解释其实是成问题的。第一,要将帛书的“火水”改为“水火”,有改字为训之嫌。第二,这四句话只残存三句,而“山泽通气”一片尚未找到。既然今本的“水火”帛书作“火水”,有没有可能今本的“山泽通气”帛书作“泽山”如何如何呢?第三,帛书《易传》其它处都从今通行本卦序,唯独说此处反映了帛书《易经》卦序,这种反常是值得怀疑的。所以,从帛书《易传》所反映出的卦序和所据经文的底本来看,帛书《易传》并非是帛书《易经》的传。很可能在帛书《易传》诸篇写作时,作者们尚未见到帛书《易经》,或者见到了并没有采用它,因为帛书《易传》是后起的,其权威性尚成问题。^⑪

帛书《易传》的研究刚刚起步,对它的价值的深入认识也许还得有一段相当的时间,这将有待于我们大家的继续努力。